

麟經指月
上

馮夢龍全集

魏同賢
主編

2020.8
3

麟經指月
上

馮夢龍全集

魏同賢 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滬新登字 109 號

馮夢龍全集

(全四十三冊)

魏同賢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華書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1191.75 插頁223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0001—850

ISBN 7-5325-1384-X

Z · 243 定價: 1730.50 元

馮夢龍全集前言

魏同賢

馮夢龍是我國古代文學的驕傲。他以出衆的才華和辛勤的勞動對通俗文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，在史學和經學領域也作了大量的工作。盡管他的作品曾經被禁毀、篡改，他的名聲曾經被湮沒、歪曲，他的成就曾經被誤解、貶低，但經過歷史的汰洗，他的光輝終究又呈現在世人面前。

中國社會發展到明代中後期，在文學史上所呈現的歷史特點以及一大批文壇巨人如李卓吾、湯顯祖、袁宏道、馮夢龍等的出現，使之與歐洲的「文藝復興」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，并且毫不遜色。

明代初年，由于實行了一些有利于發展生產的措施，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，冶鐵業的進步，造船業的發達，絲棉織業和瓷器業的興盛，都遠遠超出了前代。特別是地處長江下游的江浙一帶，物產富饒，舟楫便利，商品經濟的發展更走在了時代的前列。萬曆年間的吏部尚

書張瀚在《松窗夢語》中曾經說到：

今天下財貨聚于京師，而半產于東南，故百工技藝之人，亦多出于東南，江右爲夥，浙直次之，閩粵又次之……民間風俗，大都江南侈于江北，而江南之侈，尤莫過于三吳。自昔吳俗習奢華，樂奇異，人情皆觀赴焉。吳製服而華，以爲非是弗文也；吳製器而美，以爲非是弗珍也。四方重吳服，而吳益工于服；四方貴吳器，而吳益工于器，是吳俗之侈者愈侈，而四方之觀赴于吳者，又安能挽而之儉也……矧工于器者終日雕鏤，器不盈握，而歲月積勞，取利倍蓰。工于織者終歲纂組，幣不盈寸，而緇銖之嫌，勝于尋丈。是盈握之器，足以當終歲之耕；累寸之華，足以當終歲之織也。茲欲使其去厚而就薄，豈不難哉！

這是一位封建士大夫的見聞和憂慮，其真實性和典型性當是不成問題的。商品經濟的繁榮培植了市民力量的上升。他們的思想願望和生活態度便敏感地反映到了文學領域，于是，離經叛道、新人輩出，馮夢龍等與時代息息相關的文壇巨人便應運而生。

馮夢龍字猶龍，又字公魚、子猶，別號龍子猶、墨憨齋主人、吳下

詞奴、姑蘇詞奴、前周柱史、七樂生、東吳畸人，又曾以顧曲散人、香月居主人、詹詹外史、茂苑野史、綠天館主人、無礙居士、可一居士等爲筆名或化名。他在《壽寧待志》中自稱是「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人」，可以確認他是寄籍吳縣的長洲人。生于萬曆十二年（1574），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（1646），終年七十二歲。至于他的家世，我們還得知不多。從他家同嘉定侯峒曾、長洲王仁孝等都有親戚關係上看，大概也是出身世家。他兄弟三人，被稱爲「吳下三馮」，可見在當地是都有些名氣的。兄名夢桂，字若木，又字丹芬，畫家，《中國畫家人名大辭典》說是「真迹罕見，未敢置評」，作品恐已不傳，其風格和成就無從得知。弟名夢熊，字非熊，晚年名師之，字少璜，號杜陵居士，太學生，潦倒一生，貧病而死。唯獨馮夢龍，由于大量不朽之作的傳世，終于又恢復了他的歷史地位，這又是不幸中之有幸了。

由于史料的匱乏，我們還不可能纂輯一部較完備的馮夢龍年譜，只能根據一鱗半爪的記載，勾勒他生平的大致輪廓。早在青年時代，馮夢龍已經受到同輩的推重，文從簡說他「早歲才華衆所驚，名場若

個不稱兄」(《馮猶龍》)。他童年和青年時期的主要精力，看來幾乎全部耗費在經學和史學方面了。他自己說：「不佞童年受經，逢人問道，四方之秘筌，盡得疏觀；廿載之苦心，亦多研悟。」(《麟經指月·發凡》)他的弟弟馮夢熊說他：「余兄猶龍，幼治《春秋》，胸中武庫，不減征南。居恒研精覃思，曰：『吾志在《春秋》。』牆壁戶牖，皆置刀筆者，積二十餘年而始愜。」(《麟經指月·序》)而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：「上下數千年，瀾翻廿一史。」(《挽馮猶龍》)他所下的這一番苦功，其成果都凝聚在後來刊印的《麟經指月》、《春秋衡庫》、《四書指月》和《網鑑統一》等著作中。這些提示要點和疏解經義的著作，固然反映了他的經學功底，可同時也透露了他治經的目的，即從讀書開始，他即期望着一般知識分子所要走的科舉仕進道路。只是由於他的機遇不濟，他沒有能像他的同社好友錢謙益那樣採取青紫，飛黃騰達，因而他的才華和抱負也就沒有得到施展的機會。

封建的科舉制度之所以沒為馮夢龍鋪平仕進道路，這可能同馮夢龍個人的思想和行爲有關。因為如果單從經學修養講，以他二十載

的苦讀，本應在科舉上有所成就，他之能以開館授徒並擔任丹徒訓導，就足以證明。他的《麟經指月》能受到梅之煥的高度評價，同樣也可證明。梅之煥在序文中說：

敝邑麻，萬山中手掌地耳，而明興，獨爲麟經藪。未暇遐溯，即數十年內，如周、如劉、如耿、如田、如李、如吾宗，科第相望，途皆由此。故四方治《春秋》者，往往問渡于敝邑，而敝邑亦居然以老馬智自任。迺吾友陳無異令吳，獨津津推轂馮生猶龍也，王大可自吳歸，亦爲余言：「吳下三馮，仲其最著」云，余拊髀者久之。無何，而馮生赴田公子約，惠來敝邑，敝邑之治《春秋》者，遂遑反問渡于馮生。《指月》一編，發傳得未曾有。余于是益重馮生，而信二君子爲知言知人也！……耿生克勵，深于《春秋》，亦喜是編，相與從臾付梓，余爲叙而行之。

馮夢龍的思想和行爲大概不會遵守封建道學的約束，異端之尤的李贄曾被馮夢龍「奉爲著蔡」。李贄推崇戲曲、小說，馮夢龍大概會受其影響，所以在萬曆三十七八年間，當李贄門生楊定見攜帶李贄評本《忠義水滸全傳》手稿來到蘇州，並由當時的吳縣令陳無異交給袁

無涯刊佈時，馮夢龍見到該稿，竟然驚喜之極，並與許自昌「相與校對再三，刪削訛誤」，另附上許自昌提供的「雜誌」和「遺事」，于萬曆四十年「精書妙刻」問世，此即今見之《出相評點忠義水滸全傳》。又據沈德符在《野獲編》中記載，馮夢龍還同《金瓶梅》有些瓜葛，說是「小修上公車，已携有此書，因與借抄挈歸，吾友馮猶龍見之驚喜，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。」可沈德符卻認為該書會「壞人心術」，沒有同意，便沒有刻成。馮夢龍對居于明代四大奇書之列的《金瓶梅》產生強烈的興趣，當不是偶然的。《金瓶梅》之在明萬曆年間出現，自然不是空穴來風，而是明代中後期社會思想與生活的綜合反映，它的驚世駭俗，竟使馮夢龍「驚喜」，正可以窺知馮氏的文學觀點與趣味。也就因此，他所搜集、整理、編輯、評注、刻印的兩本民歌集《童痴一弄·掛枝兒》、《童痴二弄·山歌》也先後問世。這是兩本總數收有八百一十餘首吳地民歌的專集。這些民歌所表現的男女情愛的大膽、熱烈，足以使封建道學家怵目驚心。而馮夢龍所肯定的似乎就着重于此，所以他在《叙山歌》中纔說：

書契以來，代有歌謠，太史所陳，并稱風雅，尚矣。自楚騷唐律，爭妍競暢，而民間性情之響，遂不得列于詩壇，于是別之曰山歌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爲，薦紳學士家不道也。唯詩壇不列，薦紳學士不道，而歌之權愈輕，歌者之心亦愈淺，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諧耳。雖然，桑間濮上，國風刺之，尼父錄焉，以是爲情真而不可廢也。山歌雖俚甚矣，獨非鄭衛之遺歟？且今雖季世，而但有假詩文，無假山歌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，故不屑假；苟其不屑假，而吾藉以存真，不亦可乎？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于太史者如彼，而近代之留于民間者如此，倘亦論世之林云爾。若夫借男女之真情，發名教之偽藥，其功于《掛枝兒》等，故錄《掛枝詞》而次及《山歌》。

這可以看作馮夢龍重視通俗文學的總宣言，它的矛頭所指可能是長期統治明代文壇的臺閣體和裝腔作勢的詩文，同時也指向了封建名教。這當然不爲正統的文人學士和當權者所容。極有意味的是，在《童痴一弄·掛枝兒》正式問世以前，他本有一本《廣掛枝兒》的刊印，可這本今天已不得見的小書卻惹起了一場軒然大波。當地縉紳、名教之徒竟據此說他「無行」、「壞人子弟」，遭致了輿論的「攻訐」，致

使馮夢龍立身無地、走投無路，只得逃到湖廣，向賞識過他的熊廷弼求助，靠着熊廷弼的「飛書當道」，事端才得以平息。這件公案，鈕琇在《觚剩續編》卷二中是這樣記述的：

熊公廷弼，當督學江南時，試卷皆親自披閱……凡有雋才宿學，甄拔無遺，吳中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。夢龍文多遊戲，《掛枝兒》小曲與《葉子新門譜》，皆其所撰。浮薄子弟，靡然傾動，至有覆家破產者，其父兄群起訐之，事不可解。適熊公在告，夢龍泛舟西江，求解于熊。相見之頃，熊忽問曰：「海內盛傳馮生掛枝曲，曾携一二冊以惠老夫否？」馮踟躕不置辭，唯唯引咎，因致千里求援之意。熊曰：「此事易，毋足慮也。我且飯子，徐爲子籌之。」……抵家後，則聞熊飛書當道，而被訐之事已釋。

馮夢龍還編輯過笑話集《笑府》，利用傳統的特別是民間流傳的笑話，表達了他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嘲弄，真正是「笑罵成文章，燁然散霞綺」（王挺語）。

他的著述如此，而他的行爲恐怕更爲名教之徒所難容。從《掛枝兒》和《山歌》中可以看出，他同社會下層人物，特別是歌兒妓女長期

廝混在一起。他同蘇州名妓侯慧卿交好，並有白首之約，後來侯慧卿別嫁他人，這使馮夢龍極爲傷感，爲此曾寫下《怨離詩》三十首以及《怨離詞》和《端二憶別》，後來還同友人唱和成《鬱陶集》。在作品中，他毫不隱諱地表達了對這位青樓女子的感情。《端二憶別·序》說：「五月底二日，即去年失慧卿之日也。日遠日疏，即欲如去年之別，亦不可得，傷心哉！行吟小齋，忽成商調，安得大喉嚨人，順風唱入玉耳耶！噫，年年有端二，歲歲無慧卿，何必人言愁，我始欲愁也！」

馮夢龍結交了不少妓女朋友，他的許多作品都與妓女有關。如《掛枝兒·送別》，即得之于妓女口中，這是在附中明白無誤地講清楚了：「後一篇，名妓馮喜生所傳也。喜美容止，善諧謔，與余稱好友。將適人之前一夕，招余話別。夜半，余且去，問喜曰：『子尚有了語否？』喜曰：『兒猶記《打草竿》及吳歌各一，所未語若者獨此耳！』因爲余歌之。」他的《馮愛生傳》和《張潤傳》，都是悲悼妓女的不幸遭遇之作，兩個名噪一時的妓女，由于所遇非人，造成一死一生，其命運同樣令人悲傷。他的傳奇《雙雄記》，即爲友人劉某背棄與妓女白

小樊誓約的「感憤」之作。如此等等，確如王挺在對他的挽詩中所說：「學道勿太拘」，「放浪忘形骸，觴咏托心理。石上聽新歌，當隄候月起。逍遙艷冶場，游戲烟花里。」所有這些，在縉紳階層、名教中人看來，大概都屬品行有虧、言行不檢的，所以在科舉中就難爲當道所取了。

馮夢龍的狂放不羈，自然會遭到封建當權者的排斥。他雖才華橫溢，早有文名，然而卻仕進無門，沉淪下層，從而造成他的落拓窮困，不得不爲衣食奔走；坐館執教，忙于著述。

據傳說，馮夢龍曾窮得無米下鍋，這見于焦循《劇說》卷三：「相傳（袁于令）《西樓記》初成，就正馮夢龍，馮不置可否。袁即席餽百金，爲入《錯夢》一折。迺《西樓》爲馮所改之本，名《楚江情》，刻墨憨齋諸劇中，凡改處皆自標于欄上。」又見于楊恩壽《詞餘叢話》卷三：「袁韞玉《西樓記》初成，就質馮夢龍。馮覽畢，置案頭，不致可否，袁惘然而別。馮方絕糧，室人以告，馮曰：『無憂，袁大令今夕餽我矣。』家人以爲誕。袁歸，躊躇至夜，忽呼燈持百金就馮，至門，門尚開，問其僕，曰：『主方秉燭相待。』袁驚趨而入。馮曰：『吾固料子必至也。詞曲俱

佳，尚少一出，今已爲增入。」迺《錯夢》也。袁不勝折服。」這事情本身，自然屬小說家言，未可盡信，然而按情理推斷，大概總是事出有因，反映着某種程度的本質真實的。

在萬曆四十三年前後，爲生活所迫，同時也是對科舉的絕望，他不得不去做廣文先生了。現知他先後教過同鄉浦、莊、陶姓的子弟，無錫吳、黃姓子弟，浙江烏程沈姓子弟等等；萬曆三十八年和四十八年，他又遠離家鄉，應「田公子」之邀到楚黃講授《春秋》。他在麻城的講學，大概獲得了成功，前引梅之煥的《叙麟經指月》也可證明，後于天啟五年刻印的《春秋衡庫》也可證明。李長庚曾在爲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說：「《衡庫》一出，而通《春秋》之三難，益《春秋》之三快。猶龍氏自言：『有此書可無觀他書。』誠確論也。《春秋》稱孤經，及比翼之，可無患孤。」

到崇禎二年（1630），馮夢龍已經是五十七歲的老人了，他纔有機會出爲貢生，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。在任期間，自編《四書指月》，教授生員。崇禎七年六月，他由丹徒訓導升爲福建壽寧知縣，于同年八月，

他即到達地處崇山峻嶺、貧瘠不堪的山城壽寧。在四年的知縣生涯中，馮夢龍才得以一展抱負，表現了他作爲清官能吏的才能。爲了革除弊政，他提出了對大造黃冊和迎送官吏的改革建議；爲了改變陋習，他親擬了《禁溺女告示》並付諸實行；爲了懲霸除惡，他微服察訪，智擒壞人；爲了發展教育，他捐俸修建學館，並親自講授《四書指月》；他還想方設法施舍藥劑、破除巫術、設阱捕虎等等。由此，《壽寧縣志》給他以高度評價，說是「政簡刑清，首尚文學。遇民以恩，待士以禮。」文從簡的概括則是：「桃李兼栽花露濕，宓琴流響訟堂清。」而當時的福建名士徐燊，則在其《壽寧馮父母詩序》中贊揚他：「蓋寧爲建屬邑，界萬山中，峰巒峭蒼，灘水澆澆，最稱僻壤。景皇帝時，始設縣治，厥土惟瘠，厥賦下□，民馴有太古風。今早起坐堂，皇理錢穀簿書，一刻可了。退食之暇，不丹鉛著書，則撚須吟咏，計閩中五十七邑，令之閑無逾先生，而令之文亦無逾先生者，顧先生雖耽乎詩，而百端苦心，政平訟理，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。」

馮夢龍離壽寧知縣爲崇禎十一年（1638）。這年他六十四歲，沒有

轉任和升遷，徑自回到家鄉。那時，「天崩地解」，內有農民起義的威脅，外有建州後金的騷亂，明王朝的末日就要到了。馮夢龍在此後的數年間，雖是家居，仍不忘憂國憂民，奔走于江浙一帶，從事着扶明、抗清、反對農民起義軍的活動。崇禎十七年春，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，朱由檢吊死煤山。他痛不欲生，編印了《甲申紀事》，表達了他濃厚的忠君思想和正統觀念。清兵入主中原，他表現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。沈自晉在其《重定南詞全譜凡例續記》中講到：

重修詞譜之役，昉于乙酉仲春，而烽火須臾，狂奔未有寧趾。丙戌夏，始得僑寓山居，猶然旦則攤書搜輯，夕則捲束置床頭，以防宵遁也。漸爾編次，迺成帙焉。春來病軀，未遑展卷，擬于長夏，將細訂之。適顧甥來屏寄語：曾入郡，訪馮子猶先生令嗣贊明，出其先人易簣時手書致囑，將所輯《墨憨詞譜》未完之稿，及他詞若干，畀我卒業。六月初，始携書並其遺筆相示，翰墨淋漓，手澤可挹。展玩愴然，不勝人琴之感，雖遺編失次，而典型具存，其所發明者多矣。先是甲申冬杪，子猶送安撫祁公，至江城（祁公前來巡按時，托子猶

遍索先詞隱傳奇及余拙刻，并吾家諸弟侄輩諸詞殆盡，響以知音，特善子猶。是日送及平川而別。即諄諄以修譜促予，予唯唯。越春初，子猶爲苕溪、武林游，道經垂虹言別，盃酒盤桓，連宵話榻，丙夜不知倦也。別時，與予爲十句之約。不意擊鼓動地，逃竄經年，想望故人，鱗鴻杳絕。迨至山頭，友人爲余言，馮先生已騎箕尾去。予大驚惋，即欲一致生芻往哭，而以展轉流離，時作獐狂鼠竄，未能行也。予忘故人乎？而故人適以臨死未竟之業相授，迺不潛心探索，尋其遺緒，而更進竿頭，不幾幽冥中負我良友。于是即予所哀輯，印合于墨懃。凡論列未備者，時從其說，且捐己見而裁注之，必另注馮稿云何，非予見所及也。

這《續記》所錄載的馮夢龍的部分行迹，倒是同王挺的挽詩可以相互印證。王挺《挽馮猶龍》有云：「去年戒行役，訂晤在鴛水。及泛西子湖，先生又行矣。石梁天姥間，于焉恣游履。忽忽念故國，匍匐千餘里。」看來他的確曾經爲了挽救明代的危亡，不顧年邁之軀，而奔波于杭州和石梁天姥之間的。後來，他回到了已陷入清軍手中的家鄉，目睹後金異族的入侵，親歷建州鐵騎的蹂躪，這對於富有愛國感情和封